



中国著名台湾问题专家李家泉先生作序

解读

1949年后台湾社会发展纪实

台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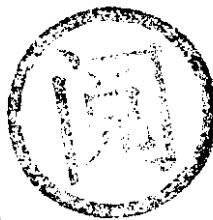
刘德久
魏秀堂 / 等著
卢新德



D675.81

01

00009605



解读台湾

——1949年后台湾社会发展纪实

112121/18

刘德久 魏秀堂 卢新德 等著



九州图书出版社



C04854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读台湾/刘德久，魏秀堂等著. —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2000. 2

ISBN 7-80114-492-9

I . 解… II . ①刘… ②魏… III . 社会发展 - 概况 - 台湾
IV . D6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1677 号

解 读 台 湾

刘德久 魏秀堂 卢新德 等著

出版发行 九洲图书出版社 (北京市车公庄大街 6 号北京市委

党校内邮编 100044 电话 6836674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长凌营印刷厂

印 张 16.5 33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7-80114-492-9/D·38

定 价 25.80 元

序（一）

国民党退据台湾五十年

——总结过去、透察现在、把握未来

李家泉

自 1949 年国共内战、国民党兵败退据台湾以来，整整 50 年了。其中两蒋时期近 40 年，李登辉时期 10 余年，两岸迄未正式结束敌状态。海峡上空风云变幻。时雨时晴，阴云常在，从未出现过持续、稳定的晴空。尤其是自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的 10 余年，形势更有愈来愈险之势。统乎独乎？和平战乎？势必作出选择。笔者认为，统则必和，独则必战。但愿两岸得以化干戈为玉帛，此乃两岸中国人之大幸，更将有利于台湾的发展。以下拟联系台湾岛内政局，就两岸 50 年来的关系及现在和未来发展发表一点看法。

一、过去“怎么看”

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三个时期的内政及其大陆政策和个人各有特点，应有实事求是的评估。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根据国际法中政府继承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原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在此前后，国民党率部分党政军人员退据台湾，拒不接受和谈条件。与此同时，发布了戒严令，封闭了台湾全省，实行军事管制，限制

出入境。从此开始了两岸迄今长达 50 年的僵持对立局面。

就台湾岛内部来说，这 50 年经历了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各有不同特点：

蒋介石时期，进行了以巩固蒋氏在台湾统治为中心内容的第一次政经改造运动。1950 年 7 月，国民党中央常会临时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改造案》，并根据这个改造案将一些异己的党政元老、军事将领、派系首脑人物等排挤出决策圈，继而整顿各级组织，进行党员登记、发展新党员，培植起一批拥护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新实力派。与此同时，还在经济上整顿财政，改革币制，稳定物价，特别是接受了大陆时期忽视农民利益的教训，实行了农地改革，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这样，就建立了以蒋氏父子为核心的对国民党的绝对控制权，奠定了国民党在台湾实行专制独裁长达数十年的统治基础。

因为战争状态没有结束，这个时期祖国大陆对台湾的基本政策是武力解放台湾，也不排除在某种可能条件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同一时期内，国民党的大陆政策主调则是“确保台湾，反攻大陆”。先是配合朝鲜战争和美国对我采取的“围堵”政策，叫嚷什么“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继而随着幻想破灭，又将“反攻大陆”改为“光复大陆”，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共方针。实际上已开始向长期打算，注重经营和建设台湾。

蒋经国时期，进行了“革新保台”和“扎根台湾”为中心内容的第二次政经改造运动。蒋经国是在蒋介石去世的前三年即 1972 年出任“行政院长”的，实际上已开始接班。从这个时候起，他面对“外交”溃败，社会矛盾上升，内忧外患齐来的局面，为“求变求存”而不得不调整内部政策，提出所谓“新人新政”的方针。其主要做法是推进“本土化”，起用新人，往下扎根。重点抓经济建设，除继续推进已有的“四年经建计划”外，

又提出“六年经建计划”，推动“十大经济建设”和“十二大经济建设”项目。主政期间，大量拔擢地方人士和社会精英，吸收了许多具有专业技术知识的人才。诸如李登辉、李国鼎、孙运璇、蒋彦士等所谓“技术型官僚”，就都是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以后吸收和录用的。这样，就使得省籍矛盾与官民矛盾有所缓和，蒋经国的个人权力地位也因而得到巩固与强化。

这个时期，祖国大陆的对台政策，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变化，已明确地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而国民党同一时期的大陆政策，则相应地调整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双方都不再强调武力了。在大陆十年“文革”动乱期间，国民党虽曾一度跃跃欲试，甚至有过“挥师北伐”的幻想，但始终未敢轻举妄动。这个期间，国民党基本上是严守阵地，静观待变，除了派遣少股特务干扰破坏外，没有明显的实际军事行动。整个说，台湾在这个时期的军费已较蒋介石时期大幅降低。

李登辉时期，进行了“本土化”和所谓“政党政治”为中心内容的第三次政经改造运动。1988年元月13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接掌党政军大权。从1990年至1997年，先后实行了四次“修宪”，包括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总统”由台湾地区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冻结台湾“省长”、“省议会”选举，虚化“台湾省政府”功能等。经过历次“宪政改革”，1949年以前在大陆时期产生的“中央民意代表”全部退职，“国民大会”、“立法院”等机构的代表全部在台湾地区选举产生，“总统”、“直辖市长”及地方县市长亦均由所在地区民众选举产生。与此同时，修改所谓“刑法”、“国安法”，取消“党禁”，使大批境外“台独”分子得以返台，使以“台湾独立建国”为诉求的台湾民主进步党获得迅速发展，成为台湾岛内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政党。1997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中，该党获得了空前胜利，

得票率第一次超过国民党，赢得了全岛 23 个县市长席位中的 12 个。

台湾岛内政局的这种发展趋势，显然并不利于祖国的和平统一和两岸关系的改善。李登辉这第三次政经改造运动所形成的大陆政策，是对和平统一方针的严重挑战。本来，港澳问题是在这个时期内按“一国两制”原则解决，应该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有某种启示和促进作用；而相反，却使李登辉为代表的分离主义势力有一种恐惧感和紧迫感，从而加快了分裂祖国的步伐，尽管李登辉分裂主义的真面目一开始还隐藏较深，但仍时有表露，如果把他上台后一年多的言论加以剖析，就可以大体归结为四个字：“一纲三目”。一纲，就是追求“独立的国际人格”。三目是，对内，加速“台湾政权台湾化”；对外，大搞“金钱务实外交”；对大陆，强调“对等政治实体”。显然早就包藏祸心，不过仍有许多迷惑和掩人耳目的词句。如今，李登辉继“七块论”，即把中国分成七大块后，又提出两岸是“国与国关系”或至少“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所有的伪装都剥下来了。

以上是笔者把 50 年来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分三个时期作出的粗浅勾画，自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不过有些问题下面还要有所涉及和阐述。

这里，拟就以上情况提出几个问题来探讨，也谈一点个人看法：

(一) 从 1949 年到 1999 这 50 年，两岸关系究竟是在前进还是后退？有人说，从经贸关系看，是在大幅度前进；而从政治关系看，则是在大幅度倒退。根据主要是因为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从“一个中国”退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我则认为，李登辉不能代表历史发展的主流。总的说，两岸政治关系也是在前进。例如，蒋介石时期，两岸关系可说是“隔海对骂”，你骂我“共匪”，我骂你“蒋匪帮”。蒋经国时期，两岸关系可说

是“单方喊话”，这时我方已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但对方就是不作任何回应。李登辉时期呢，尽管他本人是搞分裂的，他坚决反对“一国两制”，但两岸间的政治关系还是在前进和发展。且不谈民间个人或团体的接触往来，就是具有官方背景的政治接触往来，也还是不断的，一些敏感性的政治话题一样可以自由探讨。这是以前所不可比拟的。两岸之间先是“空中喊话”，各说各话，后又通过“海基会”和“海协会”面对面进行“直接对话”。这都是一种进步，不能说是后退。事物总是曲折的，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并不都是一致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也是有一致有不一致的时候，但从长远看经济关系是一切关系的基础，当然也是政治关系的基础。李登辉的“两国论”，不仅背离了国人的民族思想感情，而且缺乏应有的经济关系作基础，违背台湾人民的切身利益，因而是脆弱的。李登辉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很担忧，他抛出“两国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以政治干预经济，阻止两岸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然而，这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二）对上述三个时期中祖国大陆的对台政策、台湾的大陆政策及其相互关系应如何评估？总的说，50年来的两岸关系始终是围绕着彼此力量的消长而互动的。蒋介石时期，我方强调武力解放，台方强调武力反攻，但都限于实力和诸多因素而实际上停留于口号，形成武装僵持共处的局面。蒋经国时期，我方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台方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谁也不接受对方主张，双方没有接触和对话，形成和平僵持共处的局面。李登辉时期，情况变了，双方都想打破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我方希望通过港澳问题的和平解决，从而加速对台和平统一的进程；台方则不甘心“被统一”，从而加速分裂祖国的进程。但从50年来的发展趋势看，总的仍然是有利于“统”而不利于“独”的。蒋介石时期的“反攻梦”破灭了，蒋经国时

期的“隔绝梦”（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也破灭了，李登辉的“分裂梦”同样不能得逞。中国 12 亿人民求统一、求团结、求发展的意志是不可抗拒的。

(三) 对上述三个时期台湾地区领导人及其所执行的政策应如何评估？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其主政期间，在反共和实行独裁统治方面，尤其是蒋介石确实做了不少坏事，恶绩昭彰，尽人皆知，也早有言论，毋须赘述。但二人值得肯定的也有这样几点：(1) 坚持“一个中国”，坚决反对“台湾独立”，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顶住了美国“划峡而治”的巨大压力，表现了民族爱国主义。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并曾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多位中共领导人的充分肯定。(2) 对台湾经济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劳。蒋介石曾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币制改革等。蒋经国在发展农业、轻工业和重化工业方面更是下了功夫的。他们父子十分重视发挥经济专家的作用，为后来台湾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3) 开放台湾民众赴祖国大陆探亲。在蒋经国去世前的一、两年间，他为适应形势的发展而对大陆采取了逐步放宽的政策。1987 年 7 月，首次允许台湾民众可以香港为出境观光旅游的首站；1987 年 11 月起，进一步允许除现役军人和公职人员以外的台湾民众经过第三地转赴大陆探亲。两岸交流往来局面的打开，实际是从蒋经国开始的，这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事。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上台后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总体上并无任何实质性进展和突破。李的政治思想情况复杂，既有较强的美国价值观，又有很深的日本皇民感情。他自称是日本统治时期的“精英阶层”，别人则称他现在是不具日本国籍的“日本国民”。“两国论”出笼后，他的个人政治图谋和野心已暴露无疑。关于这方面，后面还要专门谈到。

二、现在“怎么样”

自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两岸关系上有过三次大的斗争，目前岛内和两岸围绕他的“两国论”的斗争还会继续下去。

自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岛内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台湾政权进一步“台湾化”；二是中国国民党“台湾化”；三是所谓“中华民国”也在“台湾化”。中国国民党与台湾民进党政治上趋于“合流”。两岸关系已从谁代表“一个中国”的法统之争，走向“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法理之争和法人之争。在李登辉的挑动下，两岸围绕统独问题计进行了三次较大的斗争：

第一次是1994年3月底，李登辉与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发表了一次“对话”。谈话中李大谈所谓“台湾人的悲哀”，并把悲哀的根子引向祖国大陆，指国民党为“外来政权”，质疑“中国”的概念，说两岸的统一是“奇怪的梦呓”。对话的首尾都以《旧约》圣经里《出埃及记》中率领犹太人穿越红海，返故土重建家园的摩西自况。李甚至还十分露骨地表示：“台湾必须是台湾人的东西”，欲建立“台湾人”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引发了祖国大陆、台湾岛内、港澳和海外华人对李登辉及其辩解者的言论的猛烈抨击，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李登辉分裂言行的斗争。

第二次是1995年6月，李登辉访问美国康奈尔大学并发表谈话。这一次，实际上是美台勾结所进行的一次“双簧表演”。名为“私人访问”，实为“政治访问”，不过短短四千字的讲稿，就18次谈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在台湾”。全篇讲话概括起来，不外是打“一张牌”，即“民意牌”；搞“三个推销”，即推销他自己，推销“台湾经验”，推销所谓“中华民国在台湾”；求“一个目标”，就是突破“外交困境”，拓展所谓“国际生存空

间”，从而达到与外人勾结，把台湾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目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能不作出应有的反击，除了发表多篇文章进行批驳外，还进行了数次包括试射导弹在内的军事演习，表示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和能力，取得了反“台独”、反分裂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

第三次就是1999年7月9日。李登辉继抛出“七块论”后又抛出所谓“两国论”，说什么“自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这是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正式、明确、露骨和严重的说法。这是经过他的小集团一伙精心筹划的，是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的，并扬言会陆续出台“配套措施”。这就迫使祖国大陆及所有爱国的中国人和华侨不得不起来应战。尽管在岛内外的强大舆论压力下，他的所谓“配套措施”已往回收缩，但是不会死心的，辜振甫7月底就此发表的“谈话稿”。与“陆委会”8月初就此发表的“说明书”，都只是在辩解，没有收回“两国论”的任何迹象。所以这场斗争还远未结束。

李登辉此时此刻之所以要抛出“两国论”，绝不是偶然的。主要有下面几个因素：

一是从岛内看，明春大选在即，自己在位时间不多，必须把自己的政治路线传接下去，有一种政治上的“使命感”和时间上的“紧迫感”。于是希望通过抛出“两国论”，为他的后继者指方向和定调子，并盼在他卸任后台湾能出现或保持一个“没有李登辉的李登辉政权”。

二是从国际看，认为科索沃危机后，中国驻南盟大使馆被炸，中美关系处于“低潮期”，是台湾抛出“两国论”最好时机。另一方面，李对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和对台湾的“三不支持”也有不满，欲趁机向美国表示“撒娇”、“闹别扭”或“制造点麻烦”。

三是从大陆看，李有三种恐惧感：一是香港和澳门已回归，两者都是按“一国两制”原则解决的，下一步就是台湾；二是两岸直接“三通”的呼声甚高，“戒急用忍”已有守不住之势；三是汪道涵来台必对台湾造成新的冲击。因此，就此抛出“两国论”，借以抵挡或至少延缓这些方面的压力。四是从李个人看，在台主政十余年，民主其表，独裁其里；挑动内斗，不择手段；社会失序，黑金泛滥。他个人政治上树敌颇多，经济上也并非一尘不染，对自己失去权力后同样有某种恐惧感，担心被质疑、被追究、被清算，希望选择一个可以成为自己“保护伞”的接班者。

李登辉抛出“两国论”，看起来很突然，其实见怪不怪，它有一个渐变到骤变、隐蔽到暴露的过程。这里同样可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初期阶段。大体上从 1988 年元月接班到 1990 年春被“国民大会”正式选举为“总统”时止，约两年零 5 个月时间。这段时间的特点是，刚刚上台，地位不稳，羽毛未丰，在两岸关系上大体继承蒋氏父子“一个中国”的政策。他曾经强调说：“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中国必须统一”，“中国一定要统一”。并表示反对“分裂国土”，反对“偏安的地域观念”。

第二，中期阶段。大体上是 1990 年 5 月正式接任“总统”到 1993 年 1 月完全击败“非主流”势力前，约两年零 8 个月时间。这段时间的特点是，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长”，被称为是“主流派”势力与“非主流派”势力相结合的“李郝体制”。由于以郝为代表的“非主流”仍有一定势力，因而李在摆脱“一个中国”的约束上仍有所顾忌，经常出现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模棱两可的说话场面。他只讲“对等政治实体”，并把“一个中国”界定为“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中国”。

第三，后期阶段。大体从 1993 年 2 月郝柏村已被迫下台到

1999年7月李抛出“两国论”时止，约6年零5个月时间。这段时间的特点是，非主流势力被完全排出决策核心，先后由连战、肖万长出任“行政院长”时已无须“立法院”认可。这样李在摆脱“一个中国”的约束上，几已毫无顾忌，上述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对话，访问美国与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发表的讲话，以及大搞进入联合国活动等都是在这个阶段进行的。

现在，从1999年7月9日抛出“两国论”时起，应该算是第四个阶段即最后一个阶段了。李把所有遮羞布都已一一揭去。原说的“配套措施”，包括以“两国论”来“修宪”，以及修改“国统会”章程和“两岸关系条例”等，在主观上和方向上是一定要进行的，但客观上和实践上行不行得通与敢不敢马上这样做，那自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在诸种因素中，祖国大陆的因素将是起决定作用的主导因素，绝不可能一切都以李登辉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李登辉的“两国论”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两国论”实际就是“台独论”。按照李登辉的设想，两国中的“一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国自然是“中华民国”或“台湾共和国”。在这另“一国”中，无论是叫“台湾共和国”还是延用“中华民国”称号，只是符号不同而已，实际都是“台湾国”。因为这个“中华民国”已经“台湾化”了，它的主权和领土将只及于台湾澎金马，与“台湾共和国”没有什么不同。这就踩破了中国人民所能容忍的底线，如果再不悬崖勒马，其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三、今后“怎么办？”

祖国大陆将继续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从各方面为和平统一扫除障碍，同时也应作最坏的应变准备。

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已成为祖国大

陆解决台港澳问题的基本国策。港澳问题都已按“一国两制”原则解决。台湾问题与港澳问题的性质虽不同，但同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样应按“一国两制”的原则来解决。“一国两制”有香港模式，有澳门模式，也会有不同于港澳的台湾模式。港澳问题解决以后，台湾问题已紧迫地提上日程。今后的任务将是从各方面加紧工作，排除困难和干扰，为力争祖国的早日完全统一而积极创造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要做好必要的应变准备。

（一）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冲破台湾当局所设置的种种障碍，而使“一国两制”思想深入岛内民心。现各方提出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模式很多，但最切实可行，既能满足中国人民渴望的祖国统一愿望，又能满足台湾民众当家做主的合理要求的，只有“一国两制”。两岸在这方面的分歧，不是“一国两制”适不适合于台湾，而是台湾要不要与祖国大陆实现统一的问题。由于台湾当局蓄意的扭曲和误导，使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存在各种疑惧。

其误导之一，是把“一国两制”说成是为了“吃掉”台湾，而其实“一国两制”主要着眼于台湾人民，为求稳定台湾社会，不破坏台湾现状，一句话还是为了“不吃掉”台湾。“一国两制”是在中国大陆总结“文革”教训、纠正“阶级斗争为纲”路线错误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既然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难道还要把“中国人斗中国人”的惨剧继续演下去不成？这样不正是外国干预势力所期望的吗？所以，提出“一国两制”，正是为了早日结束这种局面。即使将来中国大陆被迫不得不采取非和平手段时，仍然会实行“一国两制”，只是到那时一些顽固坚持分裂主义路线的人，将被完全剥夺发言权，台湾人民将成为这块土地上真正的主人。

其误导之二，是歪曲中国大陆提出的“一个中国”的内涵，说什么“一国两制”中的“一国”，指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其实，所谓“一个中国”，最权威解释就是1998年元月钱其琛副总理所宣布的“三原则”。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这说明，一国两制的核心内容是“一个中国”，它是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至于“一个中国”内涵，两岸可另作协商，是预留着某种弹性空间的。

其误导之三，是把“一国两制”等同于“中央对地方”。这是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混淆了。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当然是地方，也永远是地方。但作为历史遗留下来的国民党在台政权，祖国大陆从未简单地视之为“省政府”或“地方政府”。这完全可以通过对话和谈判，在共议统一中，合情合理地加以解决。李登辉的一个重要手法是，利用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个“中华民国”称号中的“国”字来进行分裂祖国的欺骗活动。

其误导之四，是把“一国两制”的统一说成是“共产统一”。而众所周知，祖国如今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谈不上什么共产主义。这个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是“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绝不可以把这样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划上等号。而且，“一国两制”是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实现“两制并存”，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就更不存在什么“共产统一”了。

其误导之五，是说两岸现在主要是“制度之争”，而不是“统独之争”，因而台湾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这是把问题和它的性质完全颠倒了。笔者认为，在国共内战时期，双方确实是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两者是主要矛盾，是对抗性和敌我性的矛盾。如今情况已经变了，两岸的统独之争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则已降为次要的非对抗性的矛盾，完全可以用“一国两制”的方法来解决。

台湾当局的上述误导，在台湾民众中造成很坏影响。台湾人

民正是在这种误导下，不明真象，才拒绝和反对“一国两制”的。不冲破这些迷惘，不把台湾民众从这些误导中解脱出来，真正的和平统一是很难实现的。和平统一实际上是一场争夺民心的舆论战，真理是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所主张的“一国两制”是符合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是可以而且应该取得成功的。

（二）必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综合国力搞上去，把国防军事现代化搞上去。这是反独防独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所不可缺少的基本保障条件。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贫穷就会受欺，落后就要挨打。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是有国际背景的，外国反华势力和干预势力之所以敢于支持“台独”，支持台湾一些人的分裂祖国的活动，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力还不够强大。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奋发图强，坚决斗争。从历史上看，台湾没有独立过，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台湾只要与祖国分离，就必然会落在外国反华势力或干预势力的控制和影响之下。绝不可重蹈历史复辙。为了保卫祖国的台湾，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分秒必争地努力增强我们的国力，国民经济的发展是综合国力和国防军事现代化的基础，我们正是依靠近20年来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才得以在过去的反“台独”、反分裂斗争中取得重大胜利。根据有关方面的资料，我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排名，1949年是第13位，1988年是第6位，应在最近几年努力的基础上争取更上一层楼，以增强自卫和应变能力。

李登辉抛出“两国论”的事实说明，以他为首的台湾一小伙政治利益集团已加速了迈向“台独”之路的步伐。其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以“两国论”为指导来“修宪”。由于多方面的因素的牵制，或许目前还不敢马上进行，但是总的目标和方向已定，只要他不收回“两国论”，不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道路上来，或早或晚总是要进行的，是不会死心的，我们绝不可能掉以轻

心。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还必须把国防军事现代化、高科技化列为更优先的目标。对岛内少数死硬的分裂主义分子，在某些外国反华势力和干预势力或明或暗的纵容和支持下所可能进行的冒险行动，必须有充分的警惕和应变准备。我们的方针是和平统一，但如果失去国民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提高下的军事实力的增强，没有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量作后盾，没有在紧急情况下采取断然行动的决心、勇气和能力，就不可能达到我们的目标。

(三) 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朋友，最大限度地孤立台湾岛内少数顽固不化的分裂主义分子以及他们在国际上的支持者。值得高兴的是，这一次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不仅两岸、港澳和海外华人社会一片批判和挞伐之声，就是广大的国际朋友、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也都纷纷对李登辉的做法表示反感、不满以至谴责。美国、日本、俄罗斯、欧盟、加拿大、东盟及其他许多国家政府和领导人，还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都发表了声明和谈话，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不变，认为李登辉的言论，不仅对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不利，也不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李登辉不但没有达到所预期的扩大台湾“国际生存空间”的目的，反而使它的这个空间更加缩小了。“一个中国”原则被国际社会进一步确认，台湾当局以及李登辉本人在国际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台湾当局最近花费重资所收买的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立的“外交”关系，据报道不过是 16 个小时就被新政府宣布“取消”了。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台湾当局与美国的关系。李登辉为了拖住美国，以支持其分裂祖国的行动，每年不惜以重资在美国进行收买活动，为中美关系制造麻烦。但是也要注意到，美国的绝大多数人民是愿意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他们对台湾当局中一些人一心分裂祖国、破坏中美关系的行径是不满的，克林顿政府及其本人所一再宣示的“三不支持”——不支持“台湾独立”，不